

旅游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吗？*

王松茂^{1,2} 何昭丽³ 郭英之^{1,4} 郭安禧⁵



- (1. 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 上海 200433;
2.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3. 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4. 复旦大学旅游学系, 上海 200433;
5. 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 上海 201400)

内容提要:针对现有文献缺乏旅游减贫多维效果及空间效应研究,本文基于多维贫困视角,运用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经济、教育、医疗、生活与环境五个维度的贫困减缓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共同构成的综合嵌套矩阵的基础上,分别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发展对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效应。主要结论有:(1)十年间,中国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纳入空间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较好地揭示出区域间乡村旅游业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十年间,各维度的减贫效果亦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表明各维度减贫效果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3)十年间,旅游发展对经济、生活、环境等维度的贫困均具有显著减缓作用,更重要的发现是旅游发展在这三个减贫维度上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发展对教育、医疗两个维度上贫困减缓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4)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分析,旅游发展对经济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步递减规律;旅游发展对生活减贫维度和环境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出由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渐增大特征。最后,论文就旅游减贫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旅游减贫 多维贫困 空间溢出 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5766(2020)05—0103—17

一、引言

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性强、就业门槛低、生态效益好等特点(Jiang等,2011)^[1],中国的贫困地区往往具有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国务院于2016年通过《“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进而实现减贫目的的具体措施,此后又陆续颁布旅游扶贫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明确了旅游减缓贫困的具体目标和内容。由此,无论

收稿日期:2019-05-23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南疆四地州旅游扶贫的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41661110);中国博士后面上基金项目“南疆四地州多维贫困测度及旅游扶贫效率研究”(2018M632028)。

作者简介:王松茂,男,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是旅游减贫、旅游经济空间分析,电子邮箱:1095929778@qq.com;何昭丽,女,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电子邮箱:245716289@qq.com;郭英之,女,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是旅游市场,电子邮箱:yingzhig@qq.com;郭安禧,男,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旅游市场营销,电子邮箱:guoanxi319@163.com。通讯作者:郭英之。

在国家政策、地方规划还是区域设计中,发展旅游业减缓贫困均被寄予厚望。近年来,中国旅游业发展迅速,产业地位显著提高,2018年全国旅游产业综合收入为9.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0%^①,许多特困地区依据自身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积极依靠旅游业脱贫致富,武陵山区、西藏、秦巴山区等多地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并取得了良好的减贫效果(宁志中等,2016)^[2]。随着旅游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旅游减贫效应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Adam和Jorge,2008)^[3]。综观旅游业与贫困关系的已有研究,旅游业与贫困减缓主要存在以下三个观点:(1)旅游减缓了贫困。学者们认为旅游业通过减少收入差距(Spencele和Meye,2012)^[4]、降低就业门槛(Eric和Neelu,2017^[5];周扬,2014^[6])、加强产业链的关联(Frederic,2014)^[7]、完善基础设施(Manuel和William,2015)^[8]等方面直接或者间接地减缓了贫困。(2)旅游发展加剧了贫困。Sharpley(2009)^[9]实证分析发现旅游业会产生严重的漏损,甚至加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Candice和Judith(2012)^[10]认为,由于旅游业就业门槛低,从业人员素质低、技能低,导致其工资普遍低于工业和高科技行业,因而这些人只是“穷忙族”。Garrigós-Simón等(2015)^[11]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角度研究发现旅游收入存在严重“漏损”现象,导致旅游减贫效应降低。Muchapondwa和Stage(2013)^[12]指出旅游业的发展会抑制当地农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存在“资源诅咒”现象。(3)旅游减贫效应的环境决定论。后结构主义认为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旅游业与贫困的关系并非是一个“非正即反”的命题,学者们研究视角也更加细化:旅游减贫具有门槛效应(郭鲁芳和李如友,2016)^[13]、存在非线性关系(赵磊等,2018)^[14]、呈现空间异质性(Deller,2010)^[15]等。Scheyvens(2011)^[16]指出对旅游减贫持否定态度的学者没有考虑到旅游业减贫需要一定的条件,旅游只是其他因素引起负面效果的“替罪羊”。

地理学第一定律指出,“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而彼此接近的事物关联更加紧密”(Tobler,1970)^[17],如果变量具有空间相关性时,忽略变量的空间效应会造成结果出现误差(Anselin,1988)^[18]。旅游产业的“吃、住、行、游、娱、购”六个基本要素均具有普遍的空间相关性(吴玉鸣,2014)^[19]。Yang和Wong(2012)^[20]从生产率溢出、劳动力流动、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市场准入溢出、合作营销、负面事件等方面分析了旅游发展空间溢出的机制。“空间”因素在旅游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受到足够的重视,那么,旅游减贫过程中是否也存在着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呢?如果存在,旅游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机理是什么?目前纳入“空间因素”的旅游减贫研究较少,仅有部分文献分析了旅游要素减贫效应的空间差异性(Deller等,2010^[15];丁建军和周书应,2018^[21]),且经验很难具有普适性。旅游减贫空间相关性、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的缺乏致使旅游业对贫困减缓的综合作用未得到全面而深刻的诠释,难以为旅游减贫的区域合作及路径选择等方面提供充足的量化依据和理论支持。另外,自Sen(1976)^[22]首次系统阐述了“能力贫困”的观点之后,众多研究者和国际组织对贫困问题的研究逐渐实现了从单一维度向多向维度的转变。然而,现有文献缺乏从多维的视角研究旅游减贫的效应。

鉴于此,文章借助中国省际面板数据^②,运用莫兰指数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从多维贫困的视角探究旅游发展水平与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相关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以期丰富旅游减贫的研究视域和理论体系,为区域旅游减贫提供有益参考。

二、机理分析

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内部因素,更会受外界环境

① 2019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9。

② 由于相关数据部分缺失,本文研究样本未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

的影响,呈现出较强的外生性,这种影响被称为溢出(王铮等,2005)^[23]。溢出可通过资本投入、人口流动、技术扩散、贸易交流等多种途径实现;溢出的方式有单向溢出、双向溢出、网络状溢出等;溢出的效应不仅表现在空间上,也存在区域间产业内及产业外。旅游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机理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1)极化—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一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便利的区位、优越的制度等条件,成为先进地区。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先进地区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会向落后地区溢出,产生“涓滴效应”(Hirschman和Sirkin,1958)^[24]。1)资本的溢出。在区域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私人资本投资遵循“趋利性”原则,集中流入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投入回报率高的区域,提高了资本的空间配置效率,产生集聚现象。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交通拥挤、能源紧张、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等问题的出现,资本会向邻近区域适度扩散,带动邻域旅游经济发展,产生旅游减贫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旅游发展资本遵循“公平性”原则,资本投资主要向邻近贫困区域倾斜,促进经济落后区域的旅游减贫效应。2)劳动力的溢出。旅游业的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流动性(Gu等,2006)^[25],与制造业不同,旅游业的生产力更多依赖于从业人员的知识、技能以及服务意识。一些来自旅游发达地区的高技能员工可能会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传播到旅游发展落后地区,提高当地旅游业的生产率,提升旅游减贫效率。3)技术的溢出。旅游较发达地区在旅游产品创新、旅游管理模式、先进技术应用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基本组成部分,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较容易“涓滴”至其他区域。

(2)示范效应。旅游减贫具有就业门槛低、产业关联强、带动作用大等特点,发挥着较强的示范带动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旅游发达地区的“旅游致富”典型案例可以增强周边区域贫困居民依靠旅游减贫的意识和信心,形成良好的旅游减贫群众基础。2)旅游企业为了实现各自的价值诉求,在现行制度供给下,不断通过结构改革、技术引进和管理升级等方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模仿优势地区同行的产品、服务、管理技能,提高生产率,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效率。3)旅游发达地区依靠旅游业减贫的成功经验,对其他地区旅游减贫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多数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阶段,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客源市场的营销、产品类型的规划等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将加快旅游减贫溢出效应的传播进程。

(3)市场准入溢出。当一个区域占有某一市场的较高份额时,其周边区域很有可能受到市场准入溢出效应的影响,从而更容易进入该市场。由于国际旅游促销往往需要较高的成本和专业的营销知识,市场准入溢出对国际旅游业发展尤为重要。市场准入溢出可降低区域旅游减贫成本,提高旅游减贫效益(Wong,2004)^[26]。

(4)旅游流溢出效应。旅游减贫的溢出效应也可能产生于需求侧,在时间、经济等约束条件的允许下,多目的地旅游者可能在一次旅游中选择多个目的地(Smith和Stephen,1983)^[27],资金、技术、先进文化等随着游客的流动而向其他区域溢出,带动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强化旅游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

(5)竞争效应。中国的主要旅游景区类型为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相邻地区可能具有相同类型的旅游景区,同质的旅游景区通常以相对同质的旅游客源地为目标,导致相邻地区在旅游发展方面存在竞争现象。在竞争的压力下,各地政府和旅游企业既要利用现有的技术提高效率,又要通过创新开发新的旅游产品。竞争效应有利于旅游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促进区域旅游对经济带动作用,提升旅游减贫效应。

综上所述,旅游减贫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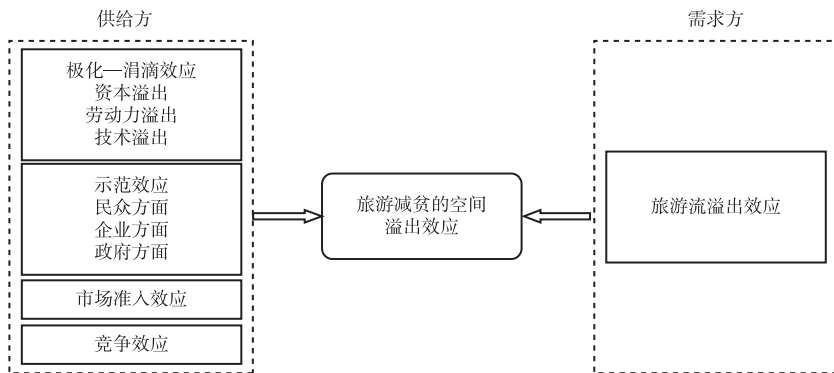


图1 旅游减贫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机理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空间权重矩阵设计一直是空间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Moran(1948)^[28]构建的邻接权重矩阵不能真实反映各省份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本文借鉴莫国莉等(2018)^[29]的做法,从多维度完善权重矩阵,分别构建了各省份间的地理权重矩阵 w_{ij}^D 和经济权重矩阵 w_{ij}^E ,并基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构建了综合嵌套矩阵 w_{ij}^O ,以期能够更真实刻画各省份之间既有距离影响又有经济影响的空间关联效应。

$$w_{ij}^D = \begin{cases} 0, & (\text{当区域 } i \text{ 与区域 } j \text{ 不相邻}) \\ 1/d_{ij}^2, & (\text{当区域 } i \text{ 与区域 } j \text{ 相邻}) \end{cases}, d_{ij} \text{ 为两省份地理中心位置的距离}$$

$$w_{ij}^E = \begin{cases} 0, & (\text{当区域 } i \text{ 与区域 } j \text{ 不相邻}) \\ 1/|\bar{Y}_i - \bar{Y}_j|, & (\text{当区域 } i \text{ 与区域 } j \text{ 相邻}) \end{cases}, \bar{Y}_i \text{ 与 } \bar{Y}_j \text{ 表示 } i \text{ 省份与 } j \text{ 省份的人均 GDP}$$

$$w_{ij}^O = w_{ij}^D \times w_{ij}^E \quad (1)$$

2. 模型设定

考虑到各省份旅游发展水平及减贫效果可能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面板的基本模型(Anselin等,2004)^[30],本文模型构建如下:

$$POV_{i,t} = \rho \cdot W \cdot POV_{i,t} + \sum_{j=1}^n \beta_j X_{j,i,t} + D \cdot X_{i,t} \cdot \theta + \mu_i + \gamma_t + V_{i,t} \quad (2)$$

$$V_{it} = \lambda \cdot E \cdot V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POV_{i,t}$ 表示各贫困减缓维度; $\rho \cdot W \cdot POV_{i,t}$ 表示贫困减缓空间滞后项; $X_{j,i,t}$ 包含旅游发展水平及控制变量; $D \cdot X_{i,t} \cdot \theta$ 表示旅游发展的空间滞后; μ_i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 γ_t 表示时间效应; $\lambda \cdot E \cdot V_{i,t}$ 表示扰动项的空间滞后, E 为扰动项的空间权重, λ 为对应的系数, ε 是均值为零,方差为 σ^2 的误差项。以上为空间计量的一般模型,具体模型为:(1)若上式中 $\lambda = 0$,则为空间杜宾模型;(2)若上式中 $\lambda = 0$ 且 $\theta = 0$,则为空间自回归模型;(3)若上式中 $\rho = 0$ 且 $\theta = 0$,则为空间误差模型。

四、变量及数据来源

1. 变量的设定

(1)被解释变量。省份 i 在 t 时期的各维度贫困减缓程度(POV_{it})。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和机

构等对贫困的内涵及根源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最初对贫困的定义主要以是否满足个体生活基本需求为判断依据,如世界银行的“一天一美元的极端贫困和一天两美元的贫困标准”(Ravallion 和 Chen,2004)^[31]。自“能力贫困”提出之后,学者们对贫困问题的研究逐渐从“经济收入”的单一维度向“教育、医疗、健康”多维度转变。本文借鉴 Alkire 和 Foster(2011)^[32]提出的多维贫困指数,构建了包含经济、教育、健康、生活、环境五个维度的贫困减缓评价体系,如表 1 所示。由于熵权法可以对多对象、多指标进行评价,且较少受到主观因素影响(张广海和赵韦舒,2017)^[33],本文选取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①数据标准化:

$$\text{正向指标: } X'_{ij} = \frac{X_{ij} - \min(X_{1j}, X_{2j}, \dots, X_{nj})}{\max(X_{1j}, X_{2j}, \dots, X_{nj}) - \min(X_{1j}, X_{2j}, \dots, X_{nj})} \quad (4)$$

$$\text{负向指标: } X'_{ij} = \frac{\max(X_{1j}, X_{2j}, \dots, X_{nj}) - X_{ij}}{\max(X_{1j}, X_{2j}, \dots, X_{nj}) - \min(X_{1j}, X_{2j}, \dots, X_{nj})} \quad (5)$$

其中, X_{ij} 为指标初始值, X'_{ij} 为标准化值。

②计算第 j 项指标在 i 个地区所占比例 A_{ij} :

$$A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 1 \leq i \leq n, 1 \leq j \leq m \quad (6)$$

其中, n 为地区个数; m 为指标个数。

③计算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E_j :

$$E_j = -\frac{1}{\ln n} \sum_{i=1}^n A_{ij} \ln A_{ij}, 0 \leq E_j \leq 1 \quad (7)$$

④计算第 j 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G_j :

$$G_j = 1 - E_j, 0 \leq G_j \leq 1 \quad (8)$$

⑤计算第 j 项指标的 W_j :

$$W_j = \frac{G_j}{\sum_{i=1}^m G_j} \quad (9)$$

表 1 多维贫困减缓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原始指标	指标方向	指标单位	平均权重
经济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_1)	正	元/人	0.0425
	人均消费支出(X_2)	正	元/人	0.0378
	农村恩格尔系数(X_3)	逆	%	0.0363
教育	农村学龄儿童在校率(X_4)	正	%	0.0412
	有文化活动室的自然村比重(X_5)	正	%	0.0423
	有幼儿园和学前班的比重(X_6)	正	%	0.0379
医疗	每千农业人口占有的医疗床位数(X_7)	正	个/千人	0.0523
	享受医疗保障的人口比例(X_8)	正	%	0.0368
	人均社会保障水平(X_9)	正	元/人	0.0412
	拥有合法行医证/卫生员行政村比重(X_{10})	正	%	0.0433

续表 1

维度	原始指标	指标方向	指标单位	平均权重
生活	每百户农户摩托车拥有量(X_{11})	正	辆	0.0486
	每百户农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X_{12})	正	台	0.0355
	户均住房面积(X_{13})	正	平米	0.0345
	使用净化自来水的农户比重(X_{14})	正	%	0.0453
	使用照明电的农户比重(X_{15})	正	%	0.0444
	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X_{16})	正	%	0.0389
	炊用柴草的农户比重(X_{17})	逆	%	0.0512
环境	水土流失治理恢复率(X_{18})	正	%	0.0488
	自然村通公路的农户比重(X_{19})	正	%	0.0368
	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X_{20})	正	%	0.0523
	广播电视覆盖的自然村比重(X_{21})	正	%	0.0511
	有效灌溉面积占比(X_{22})	正	%	0.0476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核心解释变量。“乡村旅游专业化”(Tour):Adamou(2010)^[34]采用旅游总收入与GDP之比来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并称之为“旅游专业化”。借鉴该思路,本文构建“乡村旅游专业化”,即各省份的乡村旅游总收入与GDP之比来衡量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目前,只有较少省份统计了“乡村旅游总收入”,考虑到各省份的乡村旅游总收入(RTI)与旅游总收入(TI)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由各省份的农村人口数(RP)、城镇人口数(U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RPC)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PC)等指标体现,构建如下公式计算各省份的RTI:

$$RTI = TI \times \frac{RP \times RPC}{RP \times RPC + UP \times UPC} \quad (10)$$

(3)其他控制变量。借鉴苏静(2015)^[35]等文献,选取可能影响减贫效果的四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为:当地经济发展程度(GDP),用人均GDP表征;政府干涉程度(Gov),用各省份财政支出与GDP的比例表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Invest),用各省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农村GDP的比例表征;城市化水平(Urban),用城镇人口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表征。本文变量及说明如表2所示。

表 2 各变量及其说明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贫困减缓(POV)	如表1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	乡村旅游专业化(Tour)	各省RTI/各省份GDP
其他控制变量	当地经济发展程度(GDP)	各省份人均GDP
	政府干涉程度(Gov)	财政支出/GDP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Invest)	各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各省份农村GDP
	城市化水平(Urban)	城镇人口数量/总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 数据来源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9—2018)》《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2018)》《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9—2018)》及《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8)》。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1. 空间自相关检验

空间自相关检验变量的空间分异是否存在相关性,常用莫兰指数来判断,公式如下:

$$Moran\ I = \frac{\sum_i \sum_{j \neq i} w_{ij} (X_i - \bar{x})(X_j - \bar{x})}{S^2 \sum_i \sum_{j \neq i} w_{ij}} \quad (11)$$

其中, $S^2 = \sum_{i=1}^n (x_i - \bar{x})^2 / n$, x_i, x_j 分别为区域 i, j 中样本观测值; \bar{x} 为均值;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n 为样本总量; Moran I 值分布区间为 $[-1, 1]$, Moran I > 0 , 表示样本点为空间正相关性, Moran I < 0 , 表示样本点为空间负相关性, Moran I = 0, 空间呈随机性。用统计量 Z 判定 Moran I 指数的结果, 公式如下:

$$Z = \frac{I - E(I)}{\sqrt{VAR(I)}} \quad (12)$$

其中, $E(I)$ 为 Moran I 的期望值, $VAR(I)$ 为 Moran I 的方差 (Moran, 1950)^[36]。检验旅游发展与各维度贫困减缓是否存在空间效应, 应首先分析各省份旅游发展水平和各维度贫困减缓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在上文构建的综合嵌套权重的基础上, 运用全局莫兰指数来检验 2008—2017 年中国各省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及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相关性特征, 如表 3 所示。2008—2017 年, 中国各省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莫兰指数均为正, 且 Z 值均高于临界值 1.96, 各维度减贫的莫兰指数也均为正, Z 值也均高于临界值 1.96, 结果显示具有较高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及各维度减贫的省份相互临近, 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具有较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省份间也互相邻近, 这与傅鹏等 (2018)^[37] 研究结论相一致。因此, 应进一步从空间视角来研究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

表 3 中国乡村旅游专业化与各维度减贫的莫兰指数

年份	乡村旅游专业化		经济减贫维度		教育减贫维度		医疗减贫维度		生活减贫维度		环境减贫维度	
	Moran' I	临界值 z	Moran' I	临界值 z	Moran' I	临界值 z	Moran' I	临界值 z	Moran' I	临界值 z	Moran' I	临界值 z
2008	0.167	2.208	0.156	3.512	0.175	3.088	0.166	2.929	0.184	3.422	0.354	2.406
2009	0.168	3.542	0.236	2.728	0.155	5.303	0.146	4.144	0.164	2.636	0.235	4.622
2010	0.170	2.867	0.310	4.094	0.269	3.669	0.260	2.513	0.208	4.004	0.149	3.988
2011	0.169	4.235	0.168	3.673	0.087	2.244	0.078	3.046	0.097	3.586	0.267	4.231
2012	0.168	3.887	0.239	4.612	0.158	4.672	0.249	2.522	0.167	5.013	0.138	3.333
2013	0.170	3.238	0.140	4.134	0.267	2.818	0.150	3.668	0.057	3.153	0.159	3.137
2014	0.169	2.062	0.349	2.563	0.138	3.668	0.259	4.513	0.187	5.002	0.548	2.986
2015	0.171	2.156	0.208	4.451	0.367	5.027	0.058	4.869	0.377	3.362	0.647	5.541
2016	0.173	3.585	0.122	4.708	0.351	4.283	0.232	2.125	0.150	2.619	0.321	4.602
2017	0.172	4.138	0.133	3.618	0.191	5.193	0.109	5.035	0.188	5.529	0.459	5.513

资料来源: 本文整理

2. 空间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 Wald (SAR) 和 LR (SAR) 的统计量分别为 31.285 和 37.568, Wald (SEM) 和 LR (SEM) 的统计量分别为 32.183 和 37.726, 都在 1% 的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 因此选择空间杜宾模型, Hausman 检验的统计值为 632.515, 并且通过 1% 显著性检验, 即选用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进行机理解释。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维度减贫的空间杜宾回归结果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 (FE)				
	经济减贫维度	教育减贫维度	医疗减贫维度	生活减贫维度	环境减贫维度
<i>Tour</i>	0.816*** (3.57)	0.301 (1.55)	0.035 (0.61)	0.187*** (5.91)	0.256*** (4.93)
<i>Invest</i>	-0.165 (-0.78)	0.172 (1.31)	2.189*** (4.77)	0.0226* (1.73)	0.0312* (1.68)
<i>GDP</i>	1.032*** (10.88)	0.231*** (3.23)	1.348*** (4.79)	0.106*** (5.89)	0.139*** (7.67)
<i>Urban</i>	3.367*** (11.35)	0.452** (2.21)	1.513*** (2.98)	0.562*** (11.95)	1.839*** (28.98)
<i>Gov</i>	0.913*** (5.32)	0.348*** (2.67)	2.292*** (5.21)	0.0592* (1.83)	0.079* (1.81)
$W \times Tour$	0.252* (1.79)	0.246 (0.67)	0.025 (0.16)	0.129* (1.67)	0.186* (1.78)
$W \times Invest$	-0.813 (-0.86)	0.376 (0.61)	5.877 (1.32)	-0.132 (-0.91)	0.181 (1.21)
$W \times GDP$	0.613 (1.29)	0.399 (1.57)	0.125 (0.22)	0.032 (0.58)	0.018 (0.13)
$W \times Urban$	7.637*** (4.92)	-2.208** (-2.31)	-0.692 (-0.19)	0.199 (0.79)	0.298 (1.13)
$W \times Gov$	0.041 (0.23)	0.481** (2.15)	0.392 (0.62)	0.039 (1.31)	0.041 (0.72)
ρ	0.298*** (2.31)	0.268*** (5.56)	0.142* (1.69)	0.088* (1.79)	0.081* (1.68)
Log-likelihood	391.353	882.673	108.325	560.133	856.237
样本数 <i>N</i>	300	300	300	300	300
R^2	0.956	0.711	0.723	0.961	0.959

注: *、** 和 *** 分别表示通过 1%、5% 和 10% 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为 *Z* 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1)经济减贫维度:从计量结果看,经济减贫维度的空间滞后项系数 ρ 大于 0,且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经济减贫维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特征,再次验证了经济减贫维度呈现空间集聚效应。乡村旅游专业化的回归系数、空间滞后项的系数都大于 0,且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十年间旅游业在经济维度上对于本省份的贫困减缓存在正向作用,对其他省份的贫困减缓也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旅游收入的再分配对非旅游业和相邻区域有正向经济溢出 (Winters 等, 2013)^[38],旅游投资通常表现为规划旅游景区、完善基础设施、培训人力资源等,由于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性强、辐射效应大等特点,旅游投资又对当地产生了巨大的“乘数效应”。Mitchell 和 Ashley

(2009)^[39]将旅游发展对各地经济发展作用总结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动态效应,并得出旅游业有显著的“渗透作用”和“乘数效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往往会自发流向边际生产力较高的区域,流入的劳动力不仅丰富当地劳动力资源、满足旅游生产需求,而且可以降低当地旅游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当地旅游利润。另外,伴随着高素质人力资源的进入,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也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当地生产效率,增加旅游业的竞争力。充足的信息是旅游业科学发展的基础,通过对国内外旅游业发展趋势与区域自身热点等信息的分析,可以科学制定当地旅游业发展定位、丰富旅游产品类型、精准设计与调整扶贫产品结构、增加扶贫产品附加值。对控制变量而言,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系数和空间滞后项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目的是基本建设投资和扩大再生产更多的公共产品,对于贫困居民的直接经济收入作用较小。城市化水平的回归系数、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均大于零,同时每一项检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城市化水平在经济维度上的减贫具有直接效益和空间溢出效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投资对本省份在经济维度的贫困减缓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两者的空间溢出效益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2)教育减贫维度:从计量结果看,教育减贫维度的空间滞后项系数 ρ 大于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教育减贫维度不仅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关联效应,也存在空间集聚效应。乡村旅游专业化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旅游的发展没有对当地教育贫困起到减缓作用,Janta等(2011)^[40]指出旅游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就业门槛低的特征恰好为处在就业劣势地位的贫困人群(妇女、老人和残疾人)提供了改善就业生计的机会,但长远来看,旅游业的发展并不会对当地人力资本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旅游发展对教育维度贫困的空间溢出效应也没有通过检验。就控制变量而言,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向显著水平。教育相比较而言具有更多的公共产品特性,因而政府财政支出水平、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均对本地教育改善产生积极作用。其中,城市化水平的空间滞后项系数通过负向显著性检验,表明城市化水平的发展会对相邻部分省份教育减贫起到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教育行业存在着“用脚投票”的现象。另外,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改善教育贫困,但效果并不显著,在晋升激励下的投资趋向于更有利于提升GDP的项目,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公共服务,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

(3)医疗减贫维度:医疗减贫维度的空间滞后项系数 ρ 大于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验证了医疗减贫维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具有空间集聚效应。尽管在2008—2017年,医疗贫困程度有了较大地减缓,但是,从回归结果看,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并没有对本省份或相邻省份的医疗减缓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这与Manyara和Jones(2007)^[41]、何静等(2019)^[42]研究得出旅游发展能够改善贫困地区的医疗条件结论相反,究其原因是研究样本的不同,上述学者以社区或部分省份为研究案例地。从计量结果看,其他四个控制变量对医疗贫困的减缓均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主要还是由于医疗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特性,政府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切实保障广大居民所接受的医疗服务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四个控制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4)生活减贫维度:生活减贫维度的空间滞后项系数 ρ 大于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样验证了生活减贫维度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具有空间集聚效应。乡村旅游专业化的回归系数为0.187,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验证了近十年来旅游发展在生活维度上的贫困显现出正向减缓作用。郭安禧等(2018)^[43]认为旅游开发虽然会给当地居民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总体而言,旅游的积极影响对生活质量发挥显著的正向作用,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本地及其相邻区域的社区居民开拓视野、学习先进文明、改善落后文化习俗。王松茂和郭英之(2018)^[44]也实证分析了旅游业

的发展可以提高本地和相邻区域社区居民的收入,增加就业岗位,改变社区居民的收支分配结构,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旅游业的发展健全了当地及相邻区域的生活设施、医疗设施、基础设施等,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更优质的生活空间。生活维度贫困减缓对旅游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就控制变量而言,四个变量对生活减贫维度的影响均为正向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近年来,政府按照贫困村“十一有一低于”扶贫脱帽标准投入了大量资金,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保障,改善了贫困居民的生活水平。另外,四个控制变量空间溢出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四个控制变量在生活减贫维度上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5)环境减贫维度:环境减贫维度的空间滞后项系数 ρ 大于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样验证了环境减贫维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具有空间集聚效应。乡村旅游专业化的回归系数、空间滞后项系数都为正值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十年间旅游发展在环境维度上对于本省份的贫困减缓具有正向作用,同时对其他部分省份的减贫也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近年来在生态旅游、全域旅游、乡村旅游发展带动下,农村道路硬化、居民用水用电、污水排放处理、废料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人文景观设计、文化氛围营造、周边环境绿化的力度持续加强,大大改善了贫困地区及其相邻区域的生活、生态环境(王松茂和郭英之,2019)^[45]。四个控制变量对环境减贫维度的影响均为正向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城市化水平这一因素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系数达到1.839。另外,四个控制变量空间溢出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四个控制变量在环境减贫维度上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3. 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采用空间滞后项参与检验,扩展了观察值间的相关结构,不仅会影响该区域本身(直接效应),也会间接影响相关区域的因变量(间接效应)(Elhorst,2010)^[46]。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而得到旅游发展水平对各维度减贫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如表5所示。旅游发展对经济贫困减缓的直接效应是0.827,即旅游发展每增长1%,当地经济贫困将会减缓0.827%。直接效应(0.827)大于回归系数(0.816)的主要原因是直接效应包含了“反馈效应”^①。旅游发展对经济贫困减缓的间接效应是0.461,即本省份旅游发展每增长1%,其他相关省份经济贫困的减缓程度总额为0.461%。同理,旅游发展每增长1%,当地生活贫困将会减缓0.188%,其他相关省份生活贫困的减缓程度总额为0.111%。旅游发展每增长1%,当地环境贫困将会减缓0.261%,其他相关省份环境贫困的减缓程度总额为0.138%。与面板回归估计结果一致,旅游发展对教育贫困减缓、医疗贫困减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5 旅游发展对各维度贫困的直接、间接与总效应

减贫维度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经济	0.827*** (3.78)	0.461** (2.21)	1.288*** (5.63)
教育	0.252 (0.91)	4.398 (1.33)	4.640 (1.67)
医疗	1.147 (0.53)	-13.369 (-1.18)	-12.222 (-1.32)
生活	0.188* (1.96)	0.111*** (3.65)	0.299*** (4.78)
环境	0.261** (2.11)	0.138** (2.19)	0.398*** (3.12)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为Z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① 本地区解释变量值的变化通过影响关联区域值得变化再反作用于本地区值变化的影响。

4. 各维度减贫溢出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中国地域广阔,各省份旅游资源及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导致旅游减贫空间溢出也会存在空间异质性,宏观的全国样本实证结果较难考察出旅游减贫效益的区域差异(王维艳,2018)^[47]。基于此,本研究将所涉及的30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分别进行实证分析^①。模型运算结果如表6所示,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减贫维度空间滞后项系数 ρ 均大于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经济减贫维度在东部、中部、西部内均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正向关联效应。东部、中部、西部的乡村旅游专业化回归系数和空间滞后项系数均大于0,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从空间滞后项系数大小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呈现逐渐减小的态势,表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旅游经济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逐渐减小。可能的原因有:一是东部区域的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明显强于中、西部区域;二是东部区域相较于中、西部区域,有人才密集、信息化程度高、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圈相互协作优势明显等特点;三是尽管近年来中、西部区域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旅游产业仍处于旅游发展初级阶段,产品以“吃、住、行”等消费弹性较小的旅游基本消费为主,旅游产业的关联效应较弱(杨霞和刘晓鹰,2013)^[48]。

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的生活减贫维度、环境减贫维度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东、中、西部的生活减贫维度、环境减贫维度在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作用下,总体上没有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生活减贫维度、环境减贫维度的乡村旅游专业化回归系数在东、中、西部均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另外,乡村旅游在本区域的减贫作用无论是在生活减贫维度还是在环境减贫维度都呈现出东部区域最小、中部区域居中、西部区域最大的特征。究其原因:全国十四个连片特困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区域,这些特困地区具有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旅游资源丰富等特点。许多特困地区积极发展旅游业进行脱贫,成效显著,故相较于其他产业,旅游业在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扶贫效果显著。东部区域的城镇化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区域,同时农村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等相关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近年来,乡村旅游、全域旅游的发展极大改善了中西部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提高了社区居民的人居环境质量。具体看乡村旅游专业化的空间滞后项系数:生活减贫维度方面,东部、中部区域通过显著性检验,西部区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环境减贫维度方面,中部、西部区域通过显著性检验,东部区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6 旅游减贫各维度溢出效应的空间异质性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FE)								
	经济减贫维度			生活减贫维度			环境减贫维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i>Tour</i>	0.965*** (4.49)	0.819** (2.09)	0.639*** (4.69)	0.121*** (2.61)	0.229*** (3.78)	0.362*** (4.18)	0.211*** (6.11)	0.249*** (3.79)	0.342*** (4.21)
<i>Invest</i>	-0.225 (-0.79)	0.242 (0.68)	0.368** (2.18)	0.012 (0.69)	0.149* (1.79)	0.241* (1.90)	0.166 (0.51)	0.024 (0.61)	0.038 (1.17)
<i>GDP</i>	1.495*** (6.67)	1.499*** (8.41)	2.052*** (7.71)	0.055*** (5.49)	0.089*** (5.98)	0.153*** (2.36)	0.329*** (6.29)	0.239*** (6.63)	0.376*** (7.65)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南和湖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陕西、甘肃、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青海、宁夏和新疆。

续表 6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 (FE)								
	经济减贫维度			生活减贫维度			环境减贫维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i>Urban</i>	2.586*** (8.65)	2.772*** (6.75)	3.308*** (9.12)	0.614*** (9.41)	0.565*** (9.13)	0.382*** (9.98)	2.132*** (9.55)	1.486*** (13.92)	2.310*** (13.88)
<i>Gov</i>	0.693* (1.79)	0.668** (2.18)	1.498*** (5.93)	0.061*** (3.69)	0.134** (2.11)	0.369*** (4.98)	0.088** (2.18)	0.102** (2.07)	1.125 (1.52)
$W \times Tour$	0.361* (1.88)	0.334** (2.16)	0.287*** (2.67)	0.163* (1.91)	0.213* (1.87)	0.268 (1.08)	0.266 (1.33)	0.279* (1.86)	0.287* (1.83)
$W \times Invest$	-0.678 (-0.85)	0.882 (0.81)	-0.755 (-0.91)	-0.128 (-0.62)	-0.152 (-0.34)	0.484 (1.61)	0.261 (1.49)	0.104 (0.71)	0.158* (1.88)
$W \times GDP$	0.856*** (4.51)	0.808* (1.76)	0.903** (2.15)	0.041 (0.62)	0.039 (1.25)	0.048 (1.34)	0.031 (0.11)	0.022 (0.23)	0.058 (0.19)
$W \times Urban$	5.776*** (5.68)	5.621*** (5.42)	3.495*** (3.72)	0.455 (0.46)	0.161 (0.61)	0.088 (0.46)	0.238 (1.29)	0.411*** (3.08)	0.378*** (4.13)
$W \times Gov$	0.303 (0.61)	0.038 (0.49)	0.038 (0.49)	0.056 (0.88)	0.041 (1.31)	0.032 (0.72)	0.041 (0.71)	0.056 (0.31)	0.043 (1.21)
ρ	0.542*** (3.87)	0.511*** (6.02)	0.418*** (3.49)	0.095 (0.58)	0.112 (0.48)	0.089 (1.35)	0.083 (0.59)	0.081 (0.95)	0.108 (0.87)
Log-likelihood	666.468	432.689	356.681	446.892	658.367	841.582	763.520	620.884	931.556
样本数 <i>N</i>	110	80	110	110	80	110	110	80	110
R^2	0.933	0.929	0.912	0.909	0.929	0.947	0.968	0.968	0.976

注: *、** 和 *** 分别表示通过 1%、5% 和 10% 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为 Z 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5. 稳健性检验

(1) 考虑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如表 7 所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回归结果依然显示出旅游发展对经济减贫、生活减贫、环境减贫的回归系数与空间滞后系数均为显著正向作用,旅游发展对教育减贫和医疗减贫的回归系数与空间滞后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7 基于地理权重的空间杜宾回归结果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 (FE)				
	经济减贫维度	教育减贫维度	医疗减贫维度	生活减贫维度	环境减贫维度
<i>Tour</i>	0.872* (1.89)	0.418 (0.38)	0.209 (0.62)	0.183* (1.76)	0.326** (2.03)
$W \times Tour$	0.267* (1.68)	0.337 (0.92)	0.105 (0.56)	0.176** (1.97)	0.162* (1.71)
ρ	0.323*** (3.56)	0.198** (2.02)	0.232** (1.98)	0.167* (1.79)	0.732*** (2.43)

续表 7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 (FE)				
	经济减贫维度	教育减贫维度	医疗减贫维度	生活减贫维度	环境减贫维度
Log-likelihood	454. 238	669. 532	366. 740	623. 155	866. 347
样本数 N	300	300	300	300	300
R^2	0. 821	0. 756	0. 698	0. 932	0. 911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为Z值；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在文中呈现，备索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2) 考虑模型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上文的回归过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造成内生性的可能原因：回归过程忽略了其他影响贫困减缓的重要控制变量；旅游发展水平与贫困减缓可能具有双向因果关系，随着贫困程度得到减缓，各地会进一步加大旅游投资，提升旅游发展水平。为了检验模型实证结果的稳定性，本文构建乡村旅游资源这一指标作为工具变量，采用空间SAR模型的GMM估计(余泳泽和刘大勇,2013)^[49]。李博等(2019)^[50]采用熵权TOPSIS方法构建了含有综合类旅游资源、人文类旅游资源、自然类旅游资源、支撑类旅游资源等4个维度的中国省域旅游资源竞争力评价体系。朱鹤等(2015)^[51]构建了包括自然景观类、人文景观类、休闲活动类城市旅游资源分类体系。基于以上文献，考虑工具变量相关性与外生性特征，本文选择与乡村旅游相关且避免受到经济影响的评价指标，运用熵权法构建了含有三个维度、十个指标的乡村旅游资源量化体系(如表8所示)。构建的乡村旅游资源满足工具变量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①相关性特征：乡村旅游资源与解释变量“乡村旅游专业化”具有相关性。②外生性特征：乡村旅游资源对被解释变量“贫困减缓”的影响，也是通过乡村旅游发展起作用，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评价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年鉴(2009—2018)》、国家公园网等。借助Hansen J检验，结果表明选取乡村旅游资源为工具变量较合适，与上文回归结果比较，空间GMM估计结果回归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根本变化，再次证明了上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如表9所示。

表 8 乡村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平均权重
乡村旅游资源禀赋	综合类旅游资源(0.333)	5A级旅游景区	0.0586
		4A级旅游景区	0.0355
		3A级旅游景区	0.0136
	人文类旅游资源(0.333)	世界遗产	0.045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0444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0389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0.0512
	自然类旅游资源(0.333)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0397
		国家级森林公园	0.0343
		国家级地质公园	0.0418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 9 空间 GMM 估计结果

变量	经济减贫维度	教育减贫维度	医疗减贫维度	生活减贫维度	环境减贫维度
<i>Tour</i>	0.698*** (4.21)	0.276 (1.32)	0.121 (1.37)	0.203*** (3.27)	0.268*** (2.87)
ρ	0.367*** (3.79)	0.253*** (3.99)	0.321** (1.97)	0.096* (1.88)	0.113*** (2.94)
Hansen J 检验 <i>P</i> 值	0.0000	0.0012	0.0023	0.0000	0.0016
Log-likelihood	443.266	811.753	368.252	681.145	990.753
样本数 <i>N</i>	300	300	300	300	300
R^2	0.816	0.807	0.733	0.832	0.887

注: *、** 和 *** 分别表示通过 1%、5% 和 10% 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数值为 *Z* 值;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在文中呈现,备索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六、结论与启示

1. 主要结论

本文借助 2008—2017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构建了包括经济、教育、医疗、生活、环境五个维度、22 个指标的多维减贫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乡村旅游发展对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溢出效应。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从多维减贫视角下,研究了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空间效应。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1) 十年间,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纳入空间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较好地揭示出区域间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2) 十年间,经济维度减贫、教育维度减贫、医疗维度减贫、生活维度减贫、环境维度减贫等均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证明了各维度减贫效果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

(3) 十年间,旅游发展对经济、生活、环境三个维度的贫困具有直接正向减缓作用,同时,旅游发展对这三个维度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旅游发展对经济贫困减缓的直接效应是 0.827,间接效应是 0.461;旅游发展对生活贫困减缓的直接效应是 0.188,间接效应是 0.111;旅游发展对环境贫困减缓的直接效应是 0.261,间接效应是 0.138。旅游发展对教育、医疗两个维度减贫在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4) 从空间异质性来看,旅游发展对经济减贫维度、生活减贫维度和环境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中均存在显著差异,旅游发展对经济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步递减规律;旅游发展对生活减贫维度和环境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出由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渐增大特征。

2. 政策启示

基于上文分析,得出以下政策启示:首先,重视旅游的多维减贫效应。各地政府需完善旅游减贫绩效考核制度,将多维减贫量化指标体系作为旅游减贫考核的重要依据,不仅考虑旅游减贫的经济维度,更应纳入教育、医疗、生活、环境等多种维度。

其次,强化旅游减贫的示范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对经济、生活、环境等维度的减贫效

果显著,为旅游业能够成为多数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促进发展的战略产业提供了理论基础。各地政府应继续强化当地贫困居民依靠旅游脱贫的意识,树立依靠旅游致富的模范榜样,释放贫困居民借助旅游减贫的内在潜力。

再次,注重旅游减贫的区域合作。旅游发展对经济维度、生活维度、环境维度等减贫方面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反映了区域旅游产业合作对贫困减缓的重要意义。旅游管理部门制定旅游产业减贫政策应重视与其他区域合作,充分利用旅游减贫集聚效应、旅游减贫溢出效应等特征,促进旅游各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通,扩大旅游减贫“渗透”效应、“乘数”效应。

最后,改革旅游产业减贫供给产品。各地方加强旅游产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游客消费需求为导向,立足自身优势,不断开发出参与性强、选择性多、附加值高、独特性显著的新型旅游产品,逐步优化旅游产品供给类型,让异质化的旅游产品成为游客互流的保障,增加旅游业减贫溢出效益。

参考文献

- [1] Jiang, M., T. Deiacy, and N. P. Mkiranweni, Some Evidence for Tourism Alleviating Poverty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 1181 - 1184.
- [2] 宁志中等. 中国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景区发展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 [3] Adam, B., and S. A. Jorge. Tourism and Poverty Relief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1): 107 - 126.
- [4] Spenceley, A., and D. Meyer. 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ess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ountries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2, (3): 297 - 317.
- [5] Eric, T. N., and S. Neelu. Tourism Contribution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Kenya: A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7, (4): 1 - 12.
- [6] 周扬. 中国土地流转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关系研究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4, (11): 124 - 133.
- [7] Frederic, T. Addressing the Measurement of Tourism in Terms of Poverty Reduction: Tourism Value Chain Analysis in Lao PDR and Mali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4): 368 - 376.
- [8] Manuel, V. S., and C. G. William. 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 An Economic Sector Analysis for Costa Rica and Nicaragua [J]. *Tourism Economics*, 2015, (1): 159 - 182.
- [9] Sharpley, R.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ase of the Gambia [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9, (4): 337 - 358.
- [10] Candice, G., and C. Judith. Is Tourism Employment a Sufficient Mechanism for Poverty Reduction? A Case Study from Nkhata Bay, Malawi [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2, (6): 545 - 562.
- [11] Garrigós-Simón, F. J., J. L. Galdón-Salvador, and I. Gil-Pechuán. The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Tourism Growth through Leakage Calculation [J]. *Tourism Economics*, 2015, (4): 721 - 739.
- [12] Muchapondwa, E., and J. Stage.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Tourism in Botswana, Namibia and South Africa: Is Poverty Subsiding? [J].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2013, (2): 80 - 89.
- [13] 郭鲁芳, 李如友. 旅游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J]. 杭州: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6, (6): 81 - 91.
- [14] 赵磊, 方成, 毛聪玲. 旅游业与贫困减缓——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18, (5): 13 - 25.
- [15] Deller, S. Rural Poverty, Tourism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0, (1): 180 - 205.
- [16] Scheyvens, R. *Tourism and Poverty* [M]. London: Routledge, 2011.
- [17] Tobler, W. R. A Computer Movie Simulating Urban Growth in the Detroit Region [J]. *Economic Geography*, 1970, (1): 234 - 240.
- [18] Anselin, L. *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 [M]. Dordrecht: Springer, 1988.
- [19] 吴玉鸣. 旅游经济增长及其溢出效应的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分析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14, (2): 16 - 24.
- [20] Yang Y., and K. K. Wong. A Spatial Econometric Approach to Model Spillover Effects in Tourism Flows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2, (6): 768 - 778.
- [21] 丁建军, 周书应. 武陵山片区旅游减贫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 83 - 88.

- [22] Sen, A. Poverty: 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J]. *Econometrica*, 1976, (2): 219 - 231.
- [23] 王铮, 武巍, 刘丽. 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溢出分析[J]. *北京: 地理研究*, 2005, (2): 243 - 252.
- [24] Hirschman, O. A., and G. Sirkin. Investment Criteria and Capital Intensity Once Again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8, (5): 469 - 471.
- [25] Gu, H. M., R. Raphael, C. Yu, and N. Edwi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China's Hotel Industry [J]. *China Tourism Research*, 2006, (3): 226 - 245.
- [26] Wong, K. Y. "Foreign Direct Involvement and Touris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ase from the Hotel Sector in Malaysia" [D]. London: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2004.
- [27] Smith, S., and L. J. Stephen. *Recreation Geography* [M]. New York: Longman, 1983.
- [28] Moran, P. A. P.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atistical Maps [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48, (10): 243 - 251.
- [29] 莫国莉, 张卫国, 刘永军. 变权空间权重构造及空间效应分析 [J]. *上海: 系统管理学报*, 2018, (3): 219 - 229.
- [30] Anselin, L., J. Raymond, and G. Florax. *Advances in 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ology, Tools and Applications* [M]. Berlin: Springer Verlag, 2004.
- [31] Ravallion, M., and S. Chen.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3408, 2004.
- [32] Alkire, S., and J. Foster.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7): 476 - 487.
- [33] 张广海, 赵韦舒. 中国城镇化与旅游化的动态关系、作用机制与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 PVAR 模型分析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7, (11): 116 - 133.
- [34] Adamou, A. Prospects and Limits of Tourism-Led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 *Review of Economic Analysis*, 2010, (3): 287 - 303.
- [35] 苏静.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D]. 长沙: 湖南大学, 2015.
- [36] Moran, P. A. P. Notes on Continuous Stochastic Phenomena [J]. *Biometrika*, 1950, (1/2): 17 - 23.
- [37] 傅鹏, 张鹏, 周颖. 多维贫困的空间集聚与金融减贫的空间溢出——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J]. *上海: 财经研究*, 2018, (2): 115 - 126.
- [38] Winters, P., L. Corral, and M. Moraa, Assessing the Role of Tourism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 Research Agenda [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3, (2): 177 - 202.
- [39] Mitchell, J., and C. Ashley. *Tourism and Poverty Reduction: Pathways to Prosperity* [M]. London: Routledge, 2009.
- [40] Janta, H., L. Brown, and P. Lugosi. Migrant relationships and Tourism Employment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4): 1322 - 1343.
- [41] Manyara, G., and E. Jones. Community-based Tourism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in Kenya: An Exploration of Their Potential as Avenues of Poverty Reduction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7, (6): 628 - 644.
- [42] 何静, 汪侠, 刘丹丽. 国家级贫困县旅游发展与多维贫困的脱钩关系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 [J]. *北京: 地理研究*, 2019, (5): 1189 - 1207.
- [43] 郭安禧, 郭英之, 李海军, 姜红.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支持旅游开发的影响——生活质量和社区依恋的作用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8, (2): 162 - 175.
- [44] 王松茂, 郭英之. 世界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利益诉求空间分异研究 [J]. *长沙: 经济地理*, 2018, (9): 215 - 221.
- [45] 王松茂, 郭英之. "丝绸之路经济带" 乡村旅游模范村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北五省为例 [J]. *长沙: 经济地理*, 2019, (4): 199 - 206.
- [46] Elhorst, J. P. *Applied Spatial Econometrics: Raising the Bar* [J]. *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 2010, (5): 9 - 28.
- [47] 王维艳. 社区参与下的旅游景区竞合关系演变机理及调控——基于纵向价值链的演化博弈分析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8, (6): 134 - 152.
- [48] 杨霞, 刘晓鹰. 旅游流量、旅游构成与西部地区贫困减缓 [J]. *北京: 旅游学刊*, 2013, (6): 47 - 55.
- [49] 余泳泽, 刘大勇. 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与价值链外溢效应——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的多维空间面板模型研究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3, (7): 6 - 20, 70.
- [50] 李博, 秦欢, 余建辉等. 中国省域旅游资源竞争力评价及其格局演变 [J]. *长沙: 经济地理*, 2019, (9): 231 - 240.
- [51] 朱鹤, 刘家明, 唐慧. 基于网络信息的北京市旅游资源吸引力评价及空间分析 [J]. *北京: 自然资源学报*, 2015, (12): 2081 - 2094.

Does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WANG Song-mao^{1,2}, HE Zhao-li³, GUO Ying-zhi^{1,4}, GUO An-xi⁵

(1. Post-doctoral Station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Management, ShanD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8,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46, China;

4. Tourism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5. School of Hotel Management, Shanghai Business College, Shanghai, 201400,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lack of multi-dimensional effects and spatial effects of tourism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us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7, a poverty allevi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hich including five dimensions of economy, education, health care, life and environment was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weight matrix composed of the geographic distance weight matrix and the economic distance weight matrix,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est and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spa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ach dimension The spatial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 has shown a significant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spatial agglomeration fea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which incorporates spatial effects, better reveal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regional rural tourism. (2) In the past ten years, poverty reduction in economic dimension, education dimension, medical dimension, life dimension and environment dimension have shown significant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which proves that the effect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each dimension has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3) In the past ten years,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a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of economy, life and environment. Meanwhile,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se three dimensions. The direct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poverty alleviation is 0.827,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is 0.461; the direct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living poverty alleviation is 0.188,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is 0.111; the direct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environment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0.261,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is 0.138. The direct effect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have not passed the significance test. (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dimensions of economic poverty reduction, life poverty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verty reductio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three regions of the East, the middle and the West.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dimensions of economic poverty reduction show a gradual decreasing law from the East region to the Middle region to the West region;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dimensions of life poverty reduction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poverty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verty reduction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from the East region to the Middle region to the West region.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irst of all, local governments need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tourism poverty reduction, and take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reduction quantitative index system a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ourism poverty reduction evaluation. Secondly,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ir awar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set up a model of becoming rich through tourism, and release the inherent potentia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 Thirdly, 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ooperation with other regions in formulating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of tourism industry, make full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spillover effect of tourism industry, promote the cross regional circulation of tourism production factors, expand the “penetration” effect and “multiplier” effec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overty reduc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Finally, all local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tourism products, based on their own advantages, constantly develop new tourism products with strong participation, multiple choices, high added value and significant uniqueness, increase the poverty reduction and spillover benefits of tourism industry.

Key Word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ourism poverty reduction; spatial spillover; spatial durbin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 P46, C31

DOI: 10.19616/j.cnki.bmj.2020.05.007

(责任编辑:张任之)